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 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

馬王堆医书研究組編

287

55

MAWANGDUIYISHU YANJIU ZHUANKAN

# 前 言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十多万字的简帛书,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它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其他文献姑且不谈,单是古代医药学文献就有十五种之多(除掉重复为十四种),如《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这批简帛医书,对于研究我国西汉以前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和水平,进一步探讨我国医药学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不仅可借以弄清医学史上过去由于缺乏文献资料而弄不清的某些问题,而且能为我们今后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现在,国内外对于马王堆的出土文物很重视,许多兄弟省市都积极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同时还引起了国外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注意。1979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专门召开了研究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的学术讨论会,我国曾派人参加。日本和加拿大等国也相继投入力量进行研究,日本还出版了介绍马王堆文物的专刊。香港地区的几位著名教授,更是念兹在兹,对马王堆文物有极大的兴趣。在研究马王堆出土文物方面,湖南省应当做出比外省市更大的贡献。今年年初,我们湖南中医学院与湖南省博物馆,联合成立了马王堆简帛医书研究小组,有十多个成员参加,并且得到了湖南省卫生厅和湖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随即开展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写出了部分论文,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外出考察期间,又得到各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大力支持,有的还亲自撰稿赐寄,对我们马王堆研究小组鼓舞极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鸿翔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日本国赤堀昭教授等,还分别寄来资料,专程来我组或来信加以鼓励,我们深表谢忱。为了总结阶段研究成果,交流点滴心得体会,以便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特此编印了这本《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以后还将陆续出版专辑。

由于时间匆促,再加上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0年9月20日

# 目 录

|                                  |            |
|----------------------------------|------------|
| 封面设计 .....                       | 李正光        |
| 从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看我国导引的形成和发展 .....      | 周世荣(四九)    |
| 「五十二病方」中膏脂类药物的探讨 .....           | 李钟文(四六)    |
| 「五十二病方」中药物制备工艺考察 .....           | 尚志钧(三八)    |
| 经络之起源及其与腧穴关系的探讨 .....            | 詹俊杰(三二)    |
| 「天下至道谈·七损八益」注释 .....             | 易建纯(二七)    |
| 「脉法」考释 .....                     | 马继兴(一七)    |
| 从「黄帝内经」探讨「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 .....      | 肖佐桃(一六)    |
| 「五十二病方」与「山海经」 .....              | 尚志钧(一三)    |
| 试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老子」对祖国医学的影响 ..... | 郭兵权 易法银(八) |
| 浅谈黄老哲学与古代医学 .....                | 周一谋(一)     |
| 前言 .....                         |            |

编辑者：长沙马王堆医书研究组  
 (长沙市韶山路84号)  
 邮政编码410007

出版者：湖南中医学院  
 印刷者：湖南省新华印刷厂

## CONTENTS

### Preface

A Humble Talk on Huang Lao's Philosophy and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Yimou Zhou (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Lao Zi" (two silk books) Excavated from the Han Tomb of Mawangdui upon Chinese Medicine

—Bingquan Guo Fayin Yi (8)

"Wu Shi Er Bing Fang" (Fifty Two Chinese Medical Formulas) and "San Hai Jing" (The Canon of Mountain and Sea)

—Zhijun Shang (12)

An Exploration of the Time of Formation of "Wu Shi Er Bing Fang" (Fifty Two Chinese Medical Formulas) from "Nei Jing" (The Canon of Medicine)

—Zuotao Xiao (16)

A Study on "Mai Fa" (Methods of Pulse Diagnosis)

—Jixin Ma (21)

An Explanation of "Tien Xia Zhi Dao Tan, Qi Sun Ba yi"

—Jianchun Yi (27)

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Jingluo (channels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gluo and Acupuncture Points

—Junjie Tong (33)

A Study on Technique of Chinese Drug Preparation from "Wu Shi Er Bing Fang" (Fifty Two Chinese Medical Formulas)

—Zhijun Shang (38)

An Exploration of Fat Medicament in "Wu Shi Er Bing Fang" (Fifty Two Chinese Medical Formulas)

—Zhongwen Li (43)

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Dao Yin" (functional exercises) from the Dao Yin Chart Excavated from the Han Tomb of Mawangdui

—Shirong Zhou (49)

Design of the Front Cover

—Zhengguang Li

---

## 浅谈黄老哲学与古代医学

周一谋

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人们比较熟悉，因有“五千言”的《道德经》传世。至于黄老哲学，则是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始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初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不时提到“黄老之学”，如“申子之学本于黄老”，“学黄老道德之术”，“好黄帝老子之言”<sup>①</sup>等等。西汉人喜欢将黄帝，老子扯在一起，不仅在文献里可以找到根据，而且在出土文物里也可以找到例证。

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约有十多万字，整个内容包括先秦哲学、医药学及其他各种文献。其中的《老子》有两种写本，已分别整理为“甲本”“乙本”出版。据考证，甲本可能抄写于汉高祖时期，乙本可能抄写于汉文帝时期。这两种写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老子》一书最早的本子。在《老子》乙本卷前，附有佚书四种：即《经法》《十大经》《称》和《道原》，这些也于一九七五年由文物出版社整理成一书出版。在《十大经》里，描述了黄帝和力黑、果童等的对话，将“黄学”与“老子”抄写在一起，构成了名副其实的所谓“黄老之学”。

西汉初年之所以盛行黄老哲学，绝不是偶然的。刘邦在夺取政权之后，及时总结了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五年楚汉战争之后，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安定社会，恢复生产，建立统一巩固的封建统治。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正适合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成了推行“与民休息”政策的有力思想武器。在汉代统治集团中，

从丞相曹参、陈平到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都是笃信黄老的。曹参搞的就是“无为而治”，他在代肖何为相之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约束”。<sup>②</sup>尤其是窦太后，竟然怒气冲冲地惩罚敢于批评黄老之学的轅固生，让他去和野猪搏斗，如果不是景帝送给一把锋利的匕首，轅固生险些儿送了性命。迄于汉武帝时期，虽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黄老之学仍有一定的地位。汉初七十多年间，之所以能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与推行黄老哲学是分不开的。

黄老之学在汉代又被称为道家，它对古代科学文化，特别是对古代医药的发展颇具影响。司马迁曾经说过：“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sup>③</sup>司马迁在这里高度评价了道家学说，并且满腔热忱地给以赞扬。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道家吸收了名、法、

儒、墨诸家之长，强调顺应客观规律，所以能做到事半功倍，心闲意适，这就有利于养生，有益于健康长寿，因此圣人很重视它。究竟黄老哲学对古代医学有何影响，下面拟分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强调顺应客观规律

人们知道，黄老哲学主张“清静无为”，所谓清静无为，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提倡听其自然，顺应客观规律，所以说“无为而无不为”。不论是现存的《老子》，还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都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既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又是指的客观世界本身。任何人和事物都离不开“道”，如马王堆帛书《道原》所说：“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意即万事万物都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产生和成长着，人们依赖它，运用它，却看不见它的形状，无以名之，只好叫做“道”。这个“道”，通常又可用“天”字代替。《十大经》所说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帛书还指出，办事不能操之过急，不得任意超越客观规律。如《称》所说，“毋先天成，毋非时而荣，先天成则毁，非时而荣则不果。”这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和实践所得出的结论。比如人要怀胎十个月，五个月内就不可能生出活胎，草木春天开花，夏秋成实，假若冬天开花就不可能结果。《经法》又指出：“不顺四时之度而民疾”，因此必须做到“因天之生也以养生”。

这种强调顺应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想，在古代医学领域里，特别是在《黄帝内经》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素问》所说的“法则天地”，“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等，就是这个意思。《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之行，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这段话很明白地指出，阴阳四时的变化规律，是谁也不能悖逆的，违背了就要产生病灾。聪明的人遵循它，愚蠢的人偏要违背它，两者所得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因此《灵枢·本神篇》又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内经》还强调医生必须认识和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如果诊病而“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也。”马王堆竹简《养生方》又说：“欲寿则察天地之道”。西汉医学家淳于意也提出治病要“调阴阳”，做到“与天地相应”。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论述更加精辟，他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张氏在这里科学地指出，四季气候的变化，既有利于万物的生长，又可能戕害万物，就象水能把船浮载起来，也可把船翻沉下去。对于人类来说，并无例外，关键是人们怎样认识和掌握这种自然变化的规律。祖国医学素来注重整体观念，从《内经》到历代医家，都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相应，不论给人治病，还是自己保健养生，从不排除这个因

素，这正是祖国医学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的优点之一。

## 二、阴阳能转化，柔弱胜刚强

黄老哲学特别强调事物可以由柔弱转化为刚强。阴阳、雌雄(牝牡)、刚柔都是矛盾，在通常情况下，阳、雄(牡)、刚是强者，一般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而黄老哲学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阴、雌(牝)、柔常居主导地位，成为实际上的强者。比如水是最柔弱的，但谁也不能阻住它东流入海，而且“水滴石穿”。因此《老子》说：“柔胜刚，弱胜强”。又如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而死了以后，尸体变得僵硬；草木在生长时柔脆，而死时变得枯槁。于是《老子》又说：“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胜刚强，生之徒也”。马王堆帛书《经法》也说：“短者长，弱者强”，“重柔者吉，重刚者灭”，和《老子》说的完全一致。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法》解释说：“极而反，盛而衰，天之道也，人之理也。”这就是说，事物总是要向对立面转化，由弱而强，由盛转衰，乃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们公认的道理。《老子》更进一步地解释说：“天之道其犹张弓者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在黄老之学看来，凡属阳的、雄(牡)的、刚的、强的，就必然转化成为被削弱、被减损、甚至被消灭的对象，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了避免衰亡，就得永远保持一种谦虚、恭谨和柔弱自守的地位，处处小心谨慎，不要逞能，不要孟浪行事。这种永保“雌节”的哲学思想，对于西汉政权的发展巩固，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损有余，补不足，刚柔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哲学思想在古代医学中也有相当地位。《内经》认为，任何健康人都是阴阳两个方面相对平衡的。“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sup>④</sup>。这就是说，阴阳调和，表里相应，人体即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一旦阴阳两方面的平衡遭到破坏，出现偏盛偏衰的现象，就叫做生病。“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sup>⑤</sup>，这就是阴阳偏盛偏衰所造成的病症。但是物极必反，阴阳又可互相转化，“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而治病就是调整阴阳，使二者重新恢复平衡。其具体的做法即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sup>⑥</sup>。“盛则泻之，虚则补之”<sup>⑦</sup>。这种以热药治寒病，寒药治热病和补虚泻实的方法，与黄老哲学所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完全吻合。唐代医家王冰所说的“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sup>⑧</sup>也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由于疾病复杂，治法多样，有标本先后的不同，有正治、反治之异，但总的来说，离不开“补不足，损有余”这一基本原则。

## 三、提倡节制嗜欲

马王堆帛书《经法》指出：“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又说，“嗜欲无穷死”，并且把“纵心欲”视为“三凶”之一。《老子》也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恬淡为上”，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认为私欲是百害的根源，劝人满足于一种简朴的生活。韩非子在解释老子的话时指出，“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又说，“民少欲则气血治”<sup>⑩</sup>。在黄老之学看来，追逐荣利，嗜欲过多，都是招灾惹祸，致病生疮的阶梯，所以主张恬淡清心，节制嗜欲。

上述观点，亦反映在古代医学中。《内经》中就有类似的论述，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它认为只有“志闲而少欲”的人，方能“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过一种“高下不相慕”的纯朴生活。由于节制嗜欲，坚持“食欲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就能做到“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嗜欲多的人恰恰相反，不但一心想飞黄腾达，而且“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这样的人，自然只能“半百而衰”。<sup>⑪</sup>

《内经》特别重视人的情志与健康的关系，强调要做到身心俱健。一个人的情志很好，自然不易生病，如《灵枢·本藏篇》所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利欲薰心的人，很难如愿以偿，就不免因“怵惕思虑”而“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内经》认为精神是人的生命的主宰者，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甚至把它作为判断死生的依据。所谓“失神者死，得神者生”，“得神者昌，失神者亡”，<sup>⑫</sup>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也说，“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认为忧喜过度必然招致病灾。《淮南子·精神训》亦有类似的论述：“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大怖发狂。”《内经》进而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又说，“喜怒不节则伤脏”，“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因此诊病时，必须了解患者的情志变化，要弄清患者是否“尝贵后贱”，“尝富后贫”，根据其精神状态，便可知道是否为“脱营”或“失精。”“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sup>⑬</sup>那些失去了权势的达官贵人，那些想做侯王而不可得的人，常常因欲望不遂而惆怅独悲，苦闷徬徨。这样的人内伤严重，一旦遭受外邪侵袭，就只能“身必败亡”了。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痛斥了那些“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人，认为他们弄得“华其外而悴其内”，最后只落得个“忘躯殉物”的下场。东汉医学家华佗不慕荣利，多次拒绝做官的征召，就是因为“晓养性之术”。晋代嵇康尤其重视陶冶情志。他在《养生论》中指出，有的人吃发汗药也不出汗，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人在饥饿时就想吃饭，一旦有悲哀的事，可以几天不吃饭。这种现象，完全是由情志决定的。然而人们并不重视这个问题，“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其实就是一怒一哀也不能忽视，因事物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积微成损，积损成衰”，就好象禾苗，多得灌溉的最后才枯黄，而少得灌溉的必然最先枯死，要想不灌溉而得收获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强调要做到“忧喜不留于意”。

晋代医学家葛洪也主张“含醇守朴，无欲无忧”。他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善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索，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sup>③</sup>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倘能不慕荣利，清心寡欲，自然不会生病降灾，便可平安无事地终其天年。梁代药物学家陶弘景隐居茅山，屏绝欲念，“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结果活了八十五岁。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也是笃信道家学说的，故又名孙真人。他主张“少欲”，认为“多欲则智昏”，“纵情恣欲”，必将成为“病本”。他把荣华富贵视为浮云流水，劝人“勿汲汲于所欲，勿惛惛怀忿恨”，否则“皆损寿命”。在生活方面，他提出“莫强酒”，“节饮食”，要做到“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要“淡食”，“不用重肉”，“食当熟嚼，使米脂入腹，勿使酒旨入肠”。人之当食，“须去烦恼”，尤其不能“暴噉”，否则“令人神惊”，“喜生百病”。<sup>④</sup>这些论述，都是孙氏养生的经验之谈，他之所以能坐享一百零二岁的高寿，成为医学家中的老寿星，与他坚持道家的养生哲学是不无关系的。

#### 四、重视内因，主张防患于未然

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中，有一篇叫“雌雄节”。它把骄横傲慢叫做“雄节”，而把恭俭谦让称为“雌节”，认为雄节招祸而雌节致福。它根据《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提出“先者恒凶，后者恒吉”的论点。但有时却“先而不凶”“后而不吉”，这又作何解释呢？它认为是由于内因不同：“先而不凶者，是恒备雌节存也；后而不吉者，是恒备雄节存也”。也就是说，决定人的吉凶祸福的因素，并非次序的先后，关键是看本身所具备的是雄节还是雌节。《十大经》还说，“中实而外正，何患不定”，也是着重从自身找原因的。又说，“怒者血气也，争者外脂肪也。怒若不发浸糜（浸淫）是为痈疽”，这同样是强调内因。愠怒在内，争斗表现于外，若内有怒气蓄积而不发泄，势必产生痈疽。《老子》说，“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因忧虑生病而设法增强自身抵抗力，自然也就不会生病了。

黄老学派还主张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后来韩非子在《喻老篇》中解释说：“千丈之隄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叫人“塞其穴”，“涂其隙”，以便杜绝“水难”和“火患”，做到“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韩非子还以扁鹊望诊蔡桓公为例，说明有病不早加防治，病情就将恶化，最终导致丧命。

古代医学既重视致病的内因，也很重视疾病的预防。《内经》认为单纯的外邪不容易产生疾病，而邪气的入侵，往往与人的正气虚弱是分不开的。《素问·评热病篇》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百病始生篇》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讲的都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即使“卒然逢疾风暴雨”也不生病，就是因为“无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内经》上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至

于正气虚弱的人，一旦遇上“虚邪之风”，就会“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于是“大病乃成”。张仲景也是重视内因的，他在《伤寒论》中分析少阳病的病因时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小柴胡汤主之。”这里的“血弱气尽”，就是指的正气虚弱，邪气因之乘虚而入，所以开处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益气 and 胃，达到扶正祛邪之目的。晋代葛洪还指出，当人们生病时，“唯怨风冷与暑湿，不知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也。”由于平时不注意保养，“体已素病，因风寒暑湿以发之耳。苟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之能伤也。”<sup>⑤</sup>葛洪的话，简明地论述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对病因的分析是很精辟的。历代医家都很重视人体的内因，治病时绝非只注意攻邪，往往还要先顾及其正气，于是“扶正祛邪”便成了祖国医学的重要施治原则。

祖国医学一贯重视疾病的预防，《内经》中便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原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就能图难于其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等到病入膏肓再治，就将预后难测，未免太晚了。因此《内经》充分肯定“上工救其萌芽”，而认为“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是不足取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也强调“上工治未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要求医生有预见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华佗提倡体育锻炼，创制“五禽之戏”，也是为了预防疾病。经常运动便使人“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这就是“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华佗之所以“年且百岁犹有壮容”，他的弟子吴普“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sup>⑥</sup>与他们坚持锻炼，积极预防疾病是分不开的。

## 结 束 语

黄老哲学对古代医学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过去总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动辄斥之为唯心主义，迷信思想等，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从上面的叙述来看，黄老哲学在西汉以前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而且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那时与神仙鬼怪，炼丹服食之类是不相参浑的。通过马王堆出土帛书及其他有关文献的研究，可知黄老哲学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对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将服食求仙之类的内容混入道家，那是东汉以后的事。清人方维甸在《校刊抱朴子序》中曾经指出：“道家宗旨，清净冲虚而已。其弊或流为权谋，或流为放诞，无所谓金丹仙药、黄白玄素、吐纳导引、禁咒符录之术也。秦汉方士绝不附会老子，即依托黄帝，亦非道家之说。”“东汉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张陵之子衡，使人为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习。神仙之附会道家，实昉于此。”很明显，将老子列为道教的祖先，实始于东汉。汉末农民起义，就曾以传教为名，打着老子的旗号。经过两晋南北朝的渲染，日益穿凿附会，弄得面目皆非，春秋时的老子李聃，竟然成了宗教神的形象。至唐高宗时，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时又被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玄元皇帝”。自魏

晋以来，玄学盛行，崇尚空谈，把老子的“清静无为”引入虚幻、空灵、神秘的境界。那些炼丹服食求仙的人，都以老子之徒自居。总之，自东汉以后，黄老之学逐渐蒙上了宗教迷信的外衣，和西汉以前有着很大的差别。

虽然东汉以后的道家思想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黄老哲学的积极部分，仍然保存在其中。中国古代有成就的医学家，大多是与道家相联系的，如华佗、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王冰等都是笃信黄老之学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黄老哲学的积极部分，如强调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主张节制嗜欲等，都是可取的。另一方面，也确实吸收了一些唯心和迷信的内容，如服食求仙及房中术之类，有的确系封建糟粕，应当扬弃，但就其主流来说，不容全盘否定。就是炼丹服食，如果去掉“求仙”的迷信成分，单纯从化学制药方面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贡献。正如英国李约瑟教授所说：“在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sup>①</sup>因此，对于魏晋以后的道家学说，也必须作具体分析，批判其消极因素，对于它的健康积极的一面，仍然应当予以肯定。

注释：

- ① 这几句话分别见于《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孟轲荀卿列传》和《外戚世家》。
- ② 引自《史记·曹相国世家》。
- ③ 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 ④ 引自《素问·生气通天论》。
- ⑤ 引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 ⑥ 引自《素问·至真要大论》。
- ⑦ 见《灵枢·经脉篇》。
- ⑧ 见王冰“《素问·至真要大论》注释。”
- ⑨ 这几句话分别见于《韩非子》的《解老篇》和《喻老篇》。
- ⑩ 各句引文见《素问·上古天真论》。
- ⑪ 这几句引文分别见于《灵枢·天年篇》和《素问·移精变气论》。
- ⑫ “怒伤肝”等句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后几句见《素问·疏五过论》。
- ⑬ 见《抱朴子·道意》。
- ⑭ 以上几句引文见《备急千金要方·养性》。
- ⑮ 见《抱朴子·极言》。
- ⑯ 以上引文见《后汉书·华佗传》。
- ⑰ 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02页。

# 试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

## 《老子》对祖国医学的影响

郭兵权 易法银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两种帛书《老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写在《老子》帛书乙本卷首还有《经法》、《十大经》等四种黄老著作。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老子》对祖国医学的影响，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和资料，特别是为研究黄老学派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时期，假托黄帝为他们的始祖，以《老子》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这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老子》中得到了证实。笔者以祖国最早的一部经典医籍《内经》为例，说明《内经》的产生和基本内容的形成，主要是受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现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 一、《内经》形成的指导思想是继承了老子的无神论的宇宙观

老子系春秋时代人，《道德经》是他的代表著作。他认为宇宙间万物的起源，并非“神”造的，而是一种自然法则，即是自然界一种客观的发展规律，老子称它为“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第二十一章）照老子的这种说法“道”是呈“惟恍惟惚”，“窈兮冥兮”的混浊状态，而混浊不是空漠无物，是有形象，有物质，也就是说有精气存在。而且精气的存在是真实可靠的，是离开人的意志独立存在的，是万物产生的最基本的物质。所以“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老子在这里所讲的“无名”和“有名”：“无名”乃是天地的原始；“有名”乃是万物的根本。而这两者的关系是：“无名”的精气产生“有名”的万物；因精气是“无”形，具有渗透性，所以能“入无间”，又因精气是“有”才能产生万物。这与祖国医学的哲学思想认定人的生存，是与宇宙自然界取得一致协调的，宇宙的起源，万物的存在，自然界的变迁，是精气运动的结果。也就是老子所讲的“道”。正如《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所讲：“岐伯曰：‘夫变化之用，

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也。”由此可以看出，《内经》的作者，已初步认识到地球是在宇宙太虚空间之中，并无凭借，而是宇宙空间大气层举托的。这些天垂象地成形的一切变化，系一种自然法则，自然现象，是“道”的作用结果，并非是“神”的主宰，所以“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灵兰秘典》）。“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宝命全形论》）。由此可见《内经》的“宇宙观”的形成，是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作为《内经》的指导思想基础。

## 二、《内经》的阴阳学说建立与老子的哲学思想是相关联的

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渊源于《易经》兼摭《河图洛书》之义，由阴阳演绎为五行，用唯物的观点应用于实践的医学上去。而《内经》中的阴阳学说虽渊源于《易经》，但《易经》或多或少带有唯心观念与玄学的色彩。而《内经》将《易经》阴阳学说摒除唯心部分，以唯物的观点，赋予新的涵义，最主要的还是得到《老子》思想的引导。其理何在？首先谈老子对阴阳的释义，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按老子所说的生一，就是“道”的开端，生二，就是阴阳，阴阳所生的三，就是万物，这和《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意义还是相同的。换一句话说凡宇宙的一切事物，由阴阳化生，都具有阴阳的两个属性，也即是说宇宙的万事万物，必具有正反两个分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表现，都依靠这阴阳两个分子所起的作用，这阴阳两个分子又相互永恒运动发展而化生万物。这种化生万物的作用，老子把它叫做“反”和“复”，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又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第十六章）。这“反”和“复”的作用，又有两条途径，一为自然正常的途径，即是阴阳这两个分子；一反一复自然正常平衡的运动发展，以化生万物，老子把它叫“常”，又叫做“常德”。这种是纯任自然正常的发展，所以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只有这样才能“无遗身殃，是为习常”（《老子》五十二章），另一个就是出于人为的，非自然正常发展的途径，即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老子最反对的。他认为道生阴阳，阴阳生万物，纯任其自然发展，则万物自然各得其所，因为这是一个宇宙间客观的自然规律，离开人类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人们只有按照客观发展规律去做，则自然水到渠成，无为无治。如果违背客观发展规律，则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即所谓“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乎矣”（《老子》第七十四章）。这一哲学思想被内经吸收。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与老子哲学的宇宙思想相同，老子认为万物都具有阴阳，万物都是负阴抱阳，必须自然正常平衡发展，冲气以为和，才能各得其所。《内经》也是认为阴阳是无尽的，“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

可胜数”)《素问·阴阳离合论》)。但阴阳要协调平衡,必须“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老子还认为万物都具备阴阳两面分子,但是如果有一个方面的分子,片面走向极端,势必引起另一方分子不正常的极端“反”和“复”的变化,这正与《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曰:不恒其德,则所胜来复、政恒其理,则所胜同化,此之谓也”(《素问·五常政大论》)。所以“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惟其如此,所以要“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内经认为“生长壮老已”,生长化收藏的发展运动,为生物界新陈代谢必然的规律,而生物界一切的生化合代谢完全系于“气”时刻不停的升降出入运动所形成,“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素问·六微旨大论》)。内经在这里所指这么重要的“气”,究竟是什么东西?原来这正是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冲气,”也就是阴阳互相抱负融和交泰的“冲气”,也可以说就是阴阳两面分子,自然正常永恒平衡发展运动所起的作用。我们如果再看一看天行学派庄子生物进化论所说:“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阴阳篇》)。“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篇》)。“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无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篇》)。“会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达生篇》),那么,我们还可以知道《内经》讲的“气化”的理论学说与天行学派的哲学思想,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 三、《内经》预防学说的指导思想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人们应当注意:“其末张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故必须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大事”(《老子》第六十三章)。《内经》把《老子》这一防患于未来的哲学思想,引入了祖国医学的预防医学中,形成上工治未病的思想。如《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这说明了祖国医学的预防思想是受老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得到了现代医学的重视。

### 四、老子自然法则的“道”是内经养生学部分的指导原则

老子认为:“道”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间“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十三章),所以宇宙万物,生长收藏都不外乎这个“道”的作用,

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第五十一章）。所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惟其如此，人们只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三章），甘其美，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所以“吾以是知无为之有益。”（《老子》第四十三章）老子这一自然法则的观点，被《内经》应用到养生学上，《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闭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谣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内经》不仅将老子的理论，应用到养生学上，而且进一步结合四时，提出春养生以奉长，夏养长以奉收，秋养收以奉藏，冬养藏以奉生的养生学的规律，这些从精神修养、调节神经、锻炼体魄、却病延年。这一理论，直到今天，都是行有效，是有科学根据的。

## 五、结 语

诸如上述，我们可以从上列举各段原文，加以相对照比较，可以肯定，祖国医学的思想形成，是在老子的哲学思想基本原理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各个学派中受老子思想影响最大的，除“道”家外，要数黄老学派。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辩证法家，也是第一个提出否定学的人。主要表现在：事物是发展运动的，其运动是不断靠外力而自身的运动，其运动发展是靠着否定的作用，否定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以及事物是对立的统一等一系列的辩证法成份。当然，老子也是有它的缺点的，“第一是他的原始性：它把精气作为宇宙本原，认为精气的活动就是‘道’的作用，可是精气本身又是不可感觉的，这样，‘道’就被人看成抽象的东西，以至发展成唯心的理论，甚至走向宗教的道路，成为道教”（《复旦大学报》1980年第四期30页）。老子的第二个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在于他把“柔弱胜刚强”加以辩证的概括，只作为一个抽象绝对原则，老子给“柔弱”以神秘的力量，使之成为宇宙的最高主宰——道。第三是他不了解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老子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精气活动的自然体现，不知道实践对促进认识的作用。第四是他的单纯的否定观点，只看到事物由正面转化到反面而不了解转化的具体内容和条件，只单纯的认识事物运动的结果，不能提高到否定之否定的原则。对于这方面，应加以注意，以免复走弯路，重犯错误。对于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颐索隐，深究详论。笔者陈一管之见、谬误难免、望其明达，多多指教。

---

# 《五十二病方》与《山海经》

---

皖南医学院 尚志钧

---

1979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五十二病方》(以下简称《病方》)。关于《病方》成书年代，该书所附第三篇论文，已作了考证，谓《病方》抄写时间不晚于秦汉之际。同时也指出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笔者将《山海经》与《病方》有关医药的内容作一对照，供研究《病方》成书年代的参考。

## 一、从医巫斗争剧烈的程度，来看《病方》成书的年代

《中国医学史》(北京中医学院主编，1978年上海科技版，第10页)云：“春秋时期，在医学领域中，也是医与巫剧烈斗争时期。”《病方》中虽有巫术祝由治法，但在全书中占的比例不大。《病方》载方283首，应用祝由治病之方29首，占全方10%左右。从整体来讲，本书治病，主要是以医药为主的，并不像春秋时期，医与巫处在均衡剧烈斗争的局面，这就提示《病方》成书时代，在春秋以后，应在战国年代。

## 二、从《病方》与《山海经》的关系，来探讨《病方》成书的年代

按《山海经》以记山、川为主，在记述山、川的同时，也附记些物产、医药等内容。但所记医药资料是零星分散的，不像《病方》所记的很集中，很有系统。由于《山海经》是记载山脉河流为主的专书，不是医药专书，那就不能强求一致了。

《病方》与《山海经》所记内容重点虽然不同，但是两书所用的词汇和术语是极其相似的，从它们所用词汇与术语的共性，可以看出《病方》与《山海经》在成书年代有相联的关系。现在把两书所用的词汇及术语择录部分内容比较如下：

(一)两书所记病名相同的很多。如《病方》有：疥、疣、痔、蛊、噬痛、痈、疽、肿……等病名。而《山海经》同样有记载。如：条，食之已疥。滑鱼，食之已疣。栳，食之已痔。亢木，食之不蛊。白鹄，食之已噬痛。天婴，可以已座(痈)。黎，可以已疽。三足龟，可以已肿。

(二)两书所记药名相同的亦很多。如甘草、黄蓍、术、芍药、藟茺、椒、桂、朴、梓、柞、榆……等，两书都有记载。

(三)两书所记治疗术语相同的亦很多。

①把病治好，两书皆称为“已”。

《病方》113页云：“令痈肿者皆已。”123页：“久疔不已，乾剝灶，渍以傅之，已。”

《山海经》云：“苦辛，食之已疔。”“丹木，食之已瘳。”

②两书称服药为食。

《病方》28页：“汁、滓皆索，食之自恣。”

《山海经》云：“彫棠，食之已聵。”“杜衡，食之已瘳。”

③两书称喝药汤为饮。

《病方》89页：“饮药浆。”97页：“取其汁尽饮之。”

《山海经》云：“帝台之浆，饮之者，不心痛。”

④两书对局部用药称为涂。

《病方》62页：“以清(酒)煮胶，以涂之。”112页：“蛇蛻，以桑汁涂之。”

《山海经》云：“流赭，以涂牛马无病。”

⑤两书都有浴法治疥。

《病方》122页：“居二日乃浴，疥已”。

《山海经》云：“黄灌，浴之已疥。”

(四)两书皆无方剂名称记载，而《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都有方剂名称。如麻黄汤、桂枝汤、五苓散等。

(五)两书皆无阴阳、五行、脏腑等名称记载，更无阴阳、五行、脏腑的联系。对于某些相对性的事物，皆以牝、牡名之。

《病方》128页：“痾有牝牡，牡高肤，牝有空(孔)。”90页：“牝痔有空(孔)而桵(弯曲)。”“牝痔有数窍。”

《山海经》云：“北山经，鵲巢，自为牝、牡。”“类，自为牝、牡。”

(六)两书对动物、植物名称皆用古名。

①两书称猪为彘。

《病方》记有彘膏、彘肉、彘矢。

《山海经》云：“北山经，其祠用一彘。”“中山经，有兽焉，其状如彘。”

②两书称野鸡为雉。

《病方》104页：“取雉式。”

《山海经》云：“西山经，有鸟状如雉。”

③两书称桃树为桃枝。

《病方》83页：“取桃支(枝)东多(向)者。”

《山海经》云：“西山经，蟠冢之山，其上多桃枝。”

④两书称白芷为藟。

《病方》113页：“白藟、白衡……凡五物等。”

《山海经》云：“北次三经，其祠皆一藟。”

⑤两书称紫草为茈。